



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第 2056 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 http://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37 代号: 1-267

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 叶帆子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在逐步深化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他先后提出“小康”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等，一步步充实和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为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发达的西方国家或中国周边快速发展的国家、地区出访考察。从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邓小平在一年时间里先后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出访考察中，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感受相同：中国当时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通过实地走访，邓小平对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在日本，当他在日产汽车工厂看到高于我国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后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78年9月12日，他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同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坦率地承认，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

鉴于深刻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在1979年党中央酝酿决策国民经济调整时，邓小平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基础薄弱、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要怎么走？1979年3月21日，经过慎重思考，他在会见英国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之所以称之为“中

国式”，主要是针对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言。几天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又概括为“中国式的现代化”。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向全党公开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提醒全党：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他郑重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是邓小平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深入研究中国发展实际基础上确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品格，表明中国人民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之外，开始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

从“小康之家”到“小康六条”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以往以生产的高指标为目标现代化，而是从人民群众吃穿用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他用“小康”形象地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体现着他对待人民群众早日过上富裕生活的热切期盼。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大平正芳对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诠释中国

式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接着，他着眼于人民生活，提出了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来衡量小康的标准，即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1000美元。小康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的国家战略具象为与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美好生活追求。从此，“奔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亿万人民广泛参与的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为验证小康目标是否符合实际，邓小平于1980年六七月间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调研。7月22日晚，他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有关小康水平的测算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八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计算，邓小平在当年10月将小康目标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描绘了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蓝图。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崭新起点。

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不能如期实现，是邓小平最放心不下的问题。1983年2月，他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进行调研。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看城市、看农村，看群众的路子、家用电器的配备，看城乡居民的精神面貌。他十分关心“翻两番”能不能如期实现，“小康水平”究竟能给群众生活带来多少变化。在苏州，当了解到当地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

番”的目标后，邓小平马上追问：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的负责同志作了具体汇报。

返京的列车上，当有人问到邓小平此行的感受时，他满意地说：“人们喜气洋洋”。3月2日，他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开会，介绍了调研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起这次苏州之行，称赞说，“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邓小平苏、浙、沪之行调研的结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康社会6条标准。较之此前的“小康之家”，“小康六条”除了收入标准外，还涉及就业、教育、文化、精神面貌等方面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深刻的实践要求。

“三步走”，中国现代化70年发展蓝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小康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70年发展蓝图，即“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蓝图被邓小平看作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宏伟目标”。

(下转2版)

追求公正廉明,反对特权专断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公心、有法度,反对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的特权专断。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无论是借权力之便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还是为迎合君主意志以暴虐手段戕害人民,都是特权的体现,都与廉洁背道而驰。

《史记》赞扬了一些公正廉明的人物。比如,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仁爱宽厚、礼贤下士。无论士人才大小,他都能谦逊有礼地对待,“不敢以其富贵骄士”,不会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轻慢他们。由于忌惮他的贤能,诸侯国十余年不敢进攻魏国。汉文帝时的宰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他为人廉洁正直,不接受私人拜访,还借机惩罚过恃宠而骄、目无礼法的宠臣邓通,受到时人赞许。

秉公执法是廉洁的内在要求,以特权逢迎君主的意愿则完全相反。《史记》对张汤的评价,就展现了对廉洁问题的深刻认识。汉武帝心向儒家学说,张汤断狱判案,就请博士弟子研究《尚书》《春秋》,提供资原来附会儒家经典的意思。张汤上奏判决的疑难案件,汉武帝认为对的,他就接受并且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出去,借此赞颂汉武帝的圣明。如果上奏受到谴责,他就顺着汉武帝的心意认错谢罪,因此罪责常常能够被宽恕。(下转2版)

重要言论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

通经之源 读史之本

《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中的学习理念

□ 吕钰琪 乔清举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清代史学家，梁启超称他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章学诚受聘于肥乡清漳书院担任讲席，同年因“中道别去”，为书院诸生牒列条数，写就《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以下简称《条训》），收录于《章学诚遗书》。

虽然章氏自谦“学植荒芜，凡所指陈，率多浅近”，但通读《条训》，可观其高识远见，谆谆于“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其中的学习理念颇值得研究。

“求其根本，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凡天下事，俱当求其根本，得其本则功省而效多，失其本则功勤而效寡。”治生以稼穡为本，为人以孝友为本，同样，学习与阅读也应当有所根本，不然泛滥无归，精力易竭。面临诸子百家、别派分源，章氏认为学问文章之本不外乎“十三经”，即今世所传的“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与《国语》。在寻求“根本”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章氏博学守约的辩证思维。首先划定“约”的范围，即“十三经”，而后“博”观，反复体贴，广泛涉猎，“宜触类旁通，少或三数千篇，多至万有余篇”，在泛览中窥风气、辨派别、通变化，摆脱局脊狭隘、孤陋寡闻。譬如“山必积高而后能兴云雨，水必积深而后能产蛟龙”。但是在“博”的基础上，又要再次返“约”，损之又损，仔细揣摩三五百篇，不可漫无边际。渐次而入，治经为文，应该先掌握文字训诂的小学工夫，而小学工夫的培养首先需要“识字”。对于文字之学，《条训》中提出，研究义理须以《尔雅》为本；研究字形须以《说文解字》为本；研究音韵须以《广韵》为本。所谓“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可见，初学者入手处不可不小心谨慎，如果能遵循根本，则必然事半功倍。

“铢积寸累，日有薄记”的学习态度。“学者工夫，贵于铢积寸累，涓涓不息，终至江河。”寻得根本后，便应孜孜矻矻，积跬步以至千里。章氏统计出“十三经”有六十四五万字，如果能日读不辍，即便是中人资质，或“遇人事蹉跎，资稟稍钝，再加倍差”，完成时间也不过7年、10年而已。“夫集段成篇，集句成段，集字成句，集画成字，然则篇章虽云丰富，未有不始于集画成字者也”，虽是竹头木屑，积少成多，终有所用，可谓“膏沃者光未有不明，本深者叶未有不茂”。另外，“闻文固贵有薄记矣，诵读经书一切学问中所有事，何者不当有薄记乎？”即在阅读积累的过程中，还应当善于“薄记”，也就是做笔记。具体而言，父兄应当为初学的童蒙子弟“多置空格簿册，使之日有注记”。这不仅会使人仔细、提升学习效率，“亦可自检用功勤惰”，当懒散嬉戏想要放弃之时，薄记往往给自己提供一

种坚持下去的动力。“其荒业而嬉及懒散而疏于学业，则登志之时，前后不能一律”，如果哪一天荒疏学业，薄记前后便无法一致，那么愧疚羞耻之心便会勃然而生，从而产生激励学习的效果。

“分别正闰，别类分求”的阅读方法。人们在阅读时往往喜欢涉猎新奇，对旧书容易厌烦抗拒，难以有恒。章氏认为必须“分别正闰”，即交替阅读。假如每天能诵习300字，则稍加调整，诵习本经200字后便换另一经书，再诵习200字。这样不仅不会对本经感到厌烦，反而“平添百字之功”。而且人的性情禀赋有平奇浓淡之分，书也有难易深浅之别，《易》多象数理致，《书》义难以画一、《诗》则贵于

风雅。如果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裁制品节，将所阅读的书目搭配得当，便可以振作心力，鼓舞精神。在阅读的过程中，如何减少遗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章氏提供了“别类分求”的记忆方法。具体而言，便是“统汇十五经传，大而制度典章，小而名物象数，标立宏纲细目，摘比排纂，以意贯之”，即将所阅读的内容提要钩玄，并有意地归置于制度典章、名物象数等不同的类别。需要注意的是，“事不经心思耳目，亦必得而辄忘”，只有亲手过一遍，才不会一目十行而轻易略过，其精神才能通彻全书，概括力、分析力也得以培养。待至类例充盈，则“纵横横覆，千态万状，俱会目前”，自然可以一隅三反、触类旁通。

“典论结合，学识并茂”的写作要领。运用分类摘记后的材料进行写作时，章氏指出，“须贯以议论，运以心思，方见华实之茂，且于一己之思，亦相决泠”，即材料要与议论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唐人刘知几于《史通》中提出论史三长：才、学、识。“才色本于天”，而“学”“识”则多由于人，“学”侧重对材料的占有，“识”侧重于思想见解。材料多寡并非评判文章的唯一标准，自古疏不破注，“经文设有舛错，注例犹存疑，注义明见抵牾，疏文曲为附会”，如果“掇经证传，引伸触类，曲畅旁搜”，看似博学，结果可能只是循环论证与同一材料的简单复制。若没有“识”的洞见，文章便只是材料的堆砌。至于“识”的培养，章氏种坚持下去的动力。“其荒业而嬉及懒散而疏于学业，则登志之时，前后不能一律”，如果哪一天荒疏学业，薄记前后便无法一致，那么愧疚羞耻之心便会勃然而生，从而产生激励学习的效果。

“分别正闰，别类分求”的阅读方法。人们在阅读时往往喜欢涉猎新奇，对旧书容易厌烦抗拒，难以有恒。章氏认为必须“分别正闰”，即交替阅读。假如每天能诵习300字，则稍加调整，诵习本经200字后便换另一经书，再诵习200字。这样不仅不会对本经感到厌烦，反而“平添百字之功”。而且人的性情禀赋有平奇浓淡之分，书也有难易深浅之别，《易》多象数理致，《书》义难以画一、《诗》则贵于

知止方有定 淡泊待名利

《史记》中的廉洁文化

□ 于文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和文学价值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展现廉洁文化深邃思考的思想宝库。司马迁在《史记》这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以说理的方式探讨廉洁文化，而是把对廉洁的高度赞扬和对腐败的激烈批判结合起来，将其寓于史实陈述、人物臧否和历史经验的探求之中。能否恪守廉洁、拒斥贪腐，不仅关乎个人的身家性命，也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倡导知止有定,反省克制物欲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定力、有节制,反对因物欲的无度追求造成的贪污受贿。渴望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关键在于能否得之有道。在财物的取与不取之间,廉洁者能够知止有定、洁身自好,贪腐者则贪得无厌、堕入深渊。

《史记》记载了清廉自持的典范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博士,因为才华出众、品行正直而

做了鲁国国相。他明确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是为官者不可以与百姓争夺利益,领取俸禄多的大官不允许谋取小利。公仪休素来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上门送鱼给他,他拒不接受。他吃了自家种的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命人把菜园中的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自家织的布质量很好,就烧毁了家里的织机。他解释道:“难道要让种菜的农民和织布的女工无处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吗?”公仪休遵循法度,按照原则行事。在他任职期间,鲁国官员的品行较为端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汉的王温舒。王温舒因敢于杀伐而得到汉武帝赏识,但他却滥用贪赃的下属。随着官职的提高,他和下属变本加厉地大肆敛财。后来,王温舒因贪婪而自杀,家人被灭族。《史记》记载“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舒死后家财竟达到千金之多。数年之后,也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的尹齐,家产还不足五十金,可见王温舒贪污数额之巨大。